



江西财经大学  
信毅学术文库

# The Landing of “Silver Age”

Monetary Silver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ilver Circulation with Copper Coins  
in Ming Dynasty

## “白银时代”的落地

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邱永志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江西财经大学信毅学术文库

# “白银时代”的落地

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邱永志 著

## The Landing of “Silver Age”

Monetary Silver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ilver Circulation with Copper Coins  
in Ming Dynas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 邱永志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

(江西财经大学信毅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7905 - 7

I. ①白… II. ①邱… III. ①银 - 货币史 - 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1819 号

· 江西财经大学信毅学术文库 ·

## “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

著 者 / 邱永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李蓉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41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05 - 7

定 价 / 9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17CZS019）阶段性成果，曾获清华大学2016年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并入选江西财经大学“信毅学术文库”，获全额资助出版

# 总序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过书籍出版，由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人类智慧得到较为完好的保存，作者思想得到快速传播，这大大地方便了知识传承与人类学习交流。当前，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巨大需求促成了中国学术出版事业的新一轮繁荣。学术能力已成为高校综合服务水平的重要体现，是高校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的关键衡量指标。

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引领学术前沿的师资队伍、作为知识载体和传播媒介的优秀作品，是高校作为学术创新主体必备的三大要素。江西财经大学较为合理的学科结构和相对优秀的师资队伍，为学校学术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学校教师教材、学术专著编撰和出版活动相当活跃。

为加强我校学术专著出版管理，锤炼教师学术科研能力，提高学术科研质量和教师整体科研水平，将师资、学科、学术等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我校决定分批次出版高质量专著系列；并选取学校“信敏廉毅”校训精神的前尾两字，将该专著系列命名为“信毅学术文库”。在此之前，我校已分批出版“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和“江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文库”。为打造学术品牌，突出江财特色，学校将上述两个系列进行整合，统一编入“信毅学术文库”。

“信毅学术文库”共选取了10部学术专著予以资助出版。这些学术专著囊括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方面内容，均为社会热点论题或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选题。这些专著不仅对专业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具有参考价值，也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专著的作者既

有学术领域的资深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优秀博士。资深学者因其学术涵养深厚，他们的学术观点代表着专业研究领域的理论前沿，对他们专著的出版能够带来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优秀博士作为青年学者，他们学术思维活跃，容易提出新的甚至是有突破性的学术观点，从而成为学术研究或学术争论的焦点，出版他们学术成果的社会效益也不言自明。一般而言，国家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该类研究成果常常在国内甚至国际专业研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本次出版的专著中也吸纳了国家级科研课题项目研究成果。

“信毅学术文库”将分期分批出版问世，我们将严格质量管理，努力提升学术专著水平，力争将“信毅学术文库”打造成为业内有影响力的高端品牌。

王 乔

2016年11月

## 序

邱永志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至今我很清晰记得他刚来清华报到时意气风发的情形，看得出当时他对清华的向往以及激动的心情。入学初我就提醒他两点，其一，要拓宽知识面；其二，研究兴趣和重点要下移。他十分珍视在清华的学习机会，在整个第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他基本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如饥似渴地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不仅如此，他在清华如鱼得水，很快适应了清华的环境并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学习条件，进步迅速。

第二年我们开始讨论选题。在选题的时段上，我明确表示希望他做清史，尤其希望他做19世纪以后中国的金融变迁研究，这样既与我正在进行的研究相关，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我也可以对他进行比较具体的指导，应该说是两全其美的选择。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仍然想继续做明史，想继续研究明代的白银问题。说实话，我当时心里是非常不情愿的，因为我对明史比较陌生，可能较难对他的研究给予具体的指导。后来我们又聊过几次，我了解到他的确钟情于明史，不仅熟悉明代史料，而且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想法。我想，博士论文对一个人一生的学术事业关系甚大，导师不可能包办学生的研究，因此应该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我们在反复交流意见之后，我最终同意了他继续进行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

仔细想来，当时我做出这个决定虽非情愿，但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明智的。此后，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讨论论文的具体努力方向。永志每有新的想法，就向我汇报；有新的苦恼，也向我提出。在此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对明代经济史的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因为，尽管明清易代，天翻地覆，但制



度层面却是清承明制，金融制度尤其如此，因此我内心也有深入了解明史的渴望。可以这么说，我们师徒二人是真正的“教学相长”，享受到了学习与科研的乐趣。

明代白银问题是一个国际性课题，近年来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可是，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多，误区很多，纠偏不易，做出独特的研究成果更为不易。比如，曾经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关于“前近代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问题等，都牵涉对明代经济的评价问题。这些问题学术界争论多年，可我们看到，目前有说服力的成果并不多见，似是而非的各种论断充斥学界。其中，白银问题是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对白银问题认识的误区和偏差，是很多荒谬论断产生的重要原因。

永志这篇博士论文的撰写相当不易。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之后，我曾经力促他选一个地区或一个时段进行深耕。他遍览各种史料，尤其是各种地方志，试图选择一个典型的地区。可是后来他发现，白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很难通过某一个地区来解释明代白银现象；另外，明代史料的局限性，也较难对某一个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尤其是很难进行细致的量化研究。因此，他决定要做一个较为宏观的研究。这时我的忧虑又产生了，我担心他把握不了这么大的题目。更为要命的是，有一天他又说，明代白银问题极其复杂，就明代讲明代是讲不清楚的，必须溯源，必须对宋元明经济史中的白银问题进行梳理，我一听脑袋都快炸裂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掉进泥坑里了吗？！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永志自己不仅肯吃苦肯下功夫，而且还有众多师友的帮助和鼓励，他终于跨过了难关，经过几年的努力，交出了一份让我非常满意的答卷。

永志这本专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其一，系统深入解释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历史基础及形成过程，指出明代货币白银化是宋金元明长时段历史演变的结果，而绝非明代突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宋代以降白银价值尺度功能的强化，金元之际赋税征银的广泛实施，白银逐渐成为交易媒介与价值储备手段，“银钞相权”格局逐渐形成，元代的纸钞转型失败与铜钱危机，元代后期纸钞的名目空心化与大明宝钞新型纸钞



的建立，铜钱作为基准价值的永久消退，金元明长时期铸钱稀少与不断强化的禁钱政策，以上诸多因素都是明代货币白银化的重要背景。

其二，深入分析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制度机理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本书提出了“洪武货币秩序”的概念并做了详细论证，认为正是因为洪武年间确立的货币制度，诸如禁银、禁钱、官定折价体系等政策的缺失，造成了明中叶之后信用制度的丧失及货币制度的混乱。明初统治者所倡行的带有强烈道德主义色彩的儒家治国理念，及对蒙元（甚至汉唐）诸种制度的承继，导致了摒弃市场的劳役和实物交换的统制模式的僵化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然而，尽管政府强力维护“洪武货币秩序”的运转，但实际上民间社会以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直在抵制这套官方的秩序，宣正之后“洪武货币秩序”便轰然倒塌（但后续影响深远）。本书通过详实的论证，提出贡赋体制用银的加速推广和基层社会用银的趋势合流，最终造成了国家货币主导权的下移和白银时代的到来。

多年来经济史的学习使他深刻体会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经济现象绝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而必须从复合性的角度尤其是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的奥秘，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三，颠覆了学术界关于明代白银的很多神话。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普遍曲解白银在明代所起的作用，“白银进步论”以及对于白银这种贵金属材质的过分强调，几乎成为很多学者高估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命题，关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等等，无不以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作为重要依据。还有学者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这近乎天方夜谭的观点却经常赢得读者的喝彩。更有海外学者将前近代尤其是明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抬高到无以伦比的水平，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上述种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永志不仅提出了批评，而且从正面阐释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就金融领域而言，明代中后期不仅没有出现近代社会转型的迹象，而是相反，违背市场规律且影响深远的“洪武货币秩序”导致货币失去良性发育的土壤，并最终内生出一套令人诧异的货币制度。在前期，作为称量形

态的白银，与丝绢、布帛、粮食等实物并没有太大区别；在后期，赋役财政的白银化也不等同于货币化税收的逻辑机制的确立，白银经济的形成也不意味着货币金融变革的开始，因为称量形态的白银具有币制上的天然缺陷。与多种铜钱并行流通所形成的银钱格局，加剧了明清货币体系的复杂性。

明代白银的深层机理一旦被揭破，则不少关于明代经济发展的神话，关于白银的神话等等，统统不复存在了。

其四，这部专著是跨学科研究的突出成果。近年来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显然，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难度是相当大的。永志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学习历史专业，因此我对他的这个选题一直比较担忧，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他到清华后，我叮嘱他要努力学习经济学知识，鼓励他选修经济学专业课程，他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和钻研，相关知识水平提高很快。更令人惊喜的是，毕业后的两年，他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当年的毕业论文，鲜见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解读；两年后修改的书稿，则处处可见地道的经济学理论阐释。我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他能借助跨学科的优势，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永志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已经在学术界中崭露头角。这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凝聚了他多年的研究心得，也是这一领域最为出色的研究成果。希望他以此为起点，戒骄戒躁，继续奋进。

是为序。

仲伟民

2018年12月23日

## 楔子：严书开论中国史上的白银

明代中后叶，国家赋役财政领域与基层交易市场逐渐行用白银，并最终形成白银支配流通领域的地步，为何会形成此种局面？这不仅是现今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即在当时，就困扰着许多文人士大夫。明清之际孙承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从历史溯源的角度纷纷做了探究。其中，顾炎武简要梳理了中国用银的历史发展过程，并认为金代末期才是中国用银之始。<sup>①</sup> 不过，明清之际另一位学人严书开<sup>②</sup>所做的分析似更为详尽、准确，却甚少引起注意。故笔者转录分析如下，以作本书之引论及背景。

他在《严逸山先生文集》卷八《濠上迓言》<sup>③</sup> 中发问道：

今天下财利，惟银司其令，不知昉自何时也？自汉迄洪、永制禄，俱以谷粟，故曰月俸若干石，未尝曰若干银也。制赋俱以钱，故曰钱粮，未尝曰银粮也。

---

① 顾氏指出，唐宋以前中国社会专用钱，不用银；唐至宋时期，先是交、广等地以金银为货币，后来福建、两广亦以银为币。金代先是铸行银货，金末发展至民间但以银论价或交易的现实，标志着“今日上下用银之始”。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银》，《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69~472页。无独有偶，王文成的研究也强调金朝在白银货币发展史上的作用。参见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② 严书开，字三求，浙江湖州归安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壬子，卒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西亭凌雪纂《南天痕》卷一九《列传三十一·逸士》对其留有简单的个人介绍：严家乃湖州大户，注重传统教育。严氏从小聪明好学，明亡时曾奔走三千里悼哭崇祯皇帝，后归乡里，专事读书，常有义举，通经济刑名之学。

③ 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0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400~403页。

严氏指出，白银在当时社会中已居于中心地位，并追问这个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在铜钱经济颇兴的汉代至明初的历史长河中，俸禄俱以粮石为标准，而不是以银两为标准；国家赋税多以钱粮为主，而不是银粮。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国货币史中的一大重要变化，即白银何时替代钱、粮成为标准。

为此，他开始回溯货币演变史，探究白银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崛起的问题。

考虞夏三币，曰黄、曰白、曰赤。然刀布之用，惟钱最广，至周而其法大备，盖用银甚寡也。秦以黄金为上币，铜锡为下币，而银不为币，第与珠、玉、龟、贝之属，为器饰宝藏而已。汉遵之，铸钱益广。王莽更汉法，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而银货次于金。其品二朱提，银重八两为一两，值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两值钱千，银之为用始此。然银一两准钱不及二百文，亦以素非习用，不可以多其值也。迨莽诛，仍复旧制。

他强调王莽铸造的“银货”乃是白银用作货币之始，原因在于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承认其货币地位，并确定了银钱的相关比价。不过，严氏明显忽视了更早时期汉武帝也曾有过类似的举动。<sup>①</sup>

严氏对于唐宋时期白银的性质及使用分析颇值得注意：

自兹迄唐宋，制国用者，惟谷粟、钱、绢三者而已。粟、绢则出之下，而供之上；钱则上布之下，而下又输之上。唐建中元年，天下钱谷之数，税钱三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宋皇祐治平中，岁入俱钱一亿万以上。固未尝以银充赋税、给经费也。唐太宗时，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可得钱数百万缗，不曰得若于万金，而曰得若于万钱。犹今

<sup>①</sup>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第四下》（中华书局，1962，第1164页）记载：武帝曾造白金三品，因随意规定银钱比价，极大高估银价，引起疯狂盗铸，牵连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五年后逐步废除。

之言，今珠者日值银若干，以其为稀有之珍也。唐敬宗时，诏浙西上脂盃妆具，观察使李德裕奏言：“本道存钱惟五十万缗，今所须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千三百两，物非土产，营索不逮。”夫谓金银非土产，则知银于是时如今粤东之珠、真南之金，出之有地，取之有制，其非恒用之物，明矣。

他认为，在唐代白银还是如域外珍奇金、珠一样，仅是一种贵重物品而非货币，国家财赋征用仅以粮食、铜钱、绢帛这三者，不少学人也赞同此观点。<sup>①</sup> 宋代被不少人视为白银货币化之开端时期。<sup>②</sup> 对于宋代，严氏分析道：

宋自澶渊戢兵，赂契丹岁币，而银遂为军国所必需。然其岁额绢则二十万匹，银则十万两。盖以绢为主，而银佐之。其后赐予臣下多用银，然必与绢同之，曰赐银绢几百两匹，不专以银也。徽宗时，助金灭辽，求燕地于金，许辽人旧岁币之外，每岁更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亦不以银代税也。靖康之祸，金人大索金银，搜括无算。及和议成，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亦不专以银也。至于税民，则始终惟取米粟、缗钱、绢帛。各郡邑志纪载颇详，而银则第为额外之供。如前所云，其出有地，其取有制，非如后之履亩而税也。理宗淳祐中，余玠为四川制置使，蜀中财赋入户部三司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三千五百余万缗，而金银、绫锦之类不预焉，此其征也。若夫制禄养兵百需，亦始终惟用米、粟、钱、绢，而银则第以交邻国，及补助经费之所不足而已。孝宗淳祐戊申，因春寒雨雪占主，金、铁倍贵，权罢钱冶鼓铸，官吏、军兵月请画以银，折估价既高，市价随涨，遂仍复冶铸。理宗开庆中，诏诸路出师御蒙古，大出内帑，犒师前后出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贾似道抑买公田法，租一石赁钱四十缗，价稍多给银、绢及度牒

① 参见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第265～266页。

② 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告身，此其征也。然则宋以前之银，其不专重于世也，彰彰矣。

严氏注意到了北宋时期白银使用增加的情况，然国家赋税制用依然倚重粮米、铜钱、绢帛，银主要用于对外支付岁币和对内赏赐臣下，且多与绢一同兼使。到了南宋，白银的作用逐步增加，军俸、赏赐、租税亦有行用，但不专用银，且佐以绢帛，有补充经费不足之意。

银之专重，其始于辽，而极于金、元之际乎。盖南北文制不同，北人得南钱无所用，故其所利，惟在于银。是时帑藏殷富，岁出一二十万，金裕如也，故遂轻许之。及靖康失守，粘没喝斡不离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括借下及倡优得金二十万、银四百万。继又搜掘戚里、宗室、内侍、僧道、技术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银六百万。后又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复得金七万、银一百十四万，犹以数不足，杀提举官，纵兵再括。盖贪暴极矣，然犹不足。以当今时，一岁征银常额也。

蒙古太祖于理宗绍定中定算赋，中原以户，西北以丁，蒙古以马，用耶律楚材之计，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立十路课税所，岁入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及河南降，户口滋息，银额增至一百二十万两，而赋税征银始此。然稽其详，大约以粟、绢充地税，而以银代钱充商税及盐铁诸利，亦未必履亩而征银也。然世祖甫定天下，即造交钞，以丝为事，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终元世特重钞法，盖亦有见于银之不可专恃矣。

严氏认为，国家重视白银是从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开始的，尤以金、元为最，这或许与南北地域因素有关。金人对金银搜刮无算，而蒙古人在建政初期财税多征银，尤以商税最为显著，但田赋主要还是仰赖粟、绢，商税征银是用来替代铜钱之不足。严氏认为忽必烈发行交钞以丝、银为本，实际证明白银还是无法单独凭赖。

洪武初，钱钞兼行。夏税征丝、绵及麦，秋粮征米，关榷、盐茶、

杂课俱征本色。及钞出，金银弗用。即赐予用银，亦皆以钞为重，而银第副之。永乐中，至禁金银交易，违者以奸恶论。竟不知其何所自，而胥天下之财币一之于银也？以予邑乌程（浙江湖州）一县言之，洪武初额丝米麦，俱征本色，至崇祯年间，米则一十三万三千四百三石零，银则八万四千四百二两零。蕞尔小邑，户丁仅六万五千九百有奇，田仅七千二百七十顷有奇，地仅八百三十顷有奇，山仅二千六百八十顷有奇，荡仅四百五十顷有奇，岁输米正耗几于十有五万，又科银正耗几于十万。嗣后增加，并漕截之银，又不啻五六万，其何以堪？举一邑而天下可知已。

作者进而论及洪武、永乐时期白银的演化状况。洪武初期国家虽然规定钱钞兼同使用，但赋税课程俱征本色。这时期即使赏赐用银，也是以宝钞为重。到了永乐时期，国家颁行最严厉的金银禁令，违反者以奸恶罪论处。继而，严氏再度追问白银崛起是从何而来？作者所举家乡乌程县之例表明，从国初赋税只征本色，到崇祯年间俱征米、银且数额增加迅速，负担十分沉重。他指出：

然其间所由变更之故，询诸博闻者，俱不得其详，意者其在宣德、正统之间乎？

可见，即使当时最博学之士，也无法道出其中详委，由此可见此问题之复杂。

盖洪武中，诸税悉征本色，实有深意。自迁都北平，距财赋之区颇远，而上与下遂俱利于轻费，何则？世席礼豫，视曩肇创，时经制渐广衍，又谷价贱，钞法多阻阂，自改折而所入倍之，此上之利也。初制精严，又最悉下情，官吏凛凛畏慎，不敢侵抑诸税户，故人乐于贖解。后浸失其意，自服食器用之细，一物足以破家，迨改折而害患息矣，此又下之利也。于是官民田本色米，大约酌十之三四折银输京，或入内库，



或入太仓。至正统中，周文襄忧抚吴，疏请分别南、浙、苏、松五郡，田粮轻重四等，有全折者，有米折相半者，有米三折七、米九折一者，而入银益广。嗣后牲、果、厨、料亦多征银，关税、盐课尽更故制，而银之为用，遂独贵于天下，自前世未之有也。

严氏认为，白银使用的变化首先发生在从征本色到改折轻资的过程中。因为永乐迁都后，运输距离拉长，国家财政支用急剧扩张，于是改折白银成为上下俱利的方式：初期折银由于米、谷市价较低，钞法阻滞，故政府因为改折而获得更多收入；而改折白银在避免小民被官吏侵科方面也有益处，故底层百姓也受改折之利。这些因素使折银开始在更广层面展开，尤其是周忱巡抚南方之后，折银更甚，白银日益卷入贡赋领域，各项“故制”也发生变革，遂使白银呈现“独贵”的局面。<sup>①</sup>

然其初折银甚轻。据予邑田税，嘉、隆以前不可考，万历十六年以后，每亩输条银五分二厘而已，自万历末年以至于今，条银一钱三分二厘矣，又增漕截银约七分矣，而加耗不与焉，是四倍于前，而又过之也。

政府初期折银，公私俱利；后期折银，百姓负担增加很多。严氏以本县为例说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后每亩只输银0.052两，而万历末至明末增至0.132两，此外还有漕截银约0.07两（不含加耗），总计0.202两，约计增加了3倍。

夫米、粟出于土田，丝、绢本之蚕织，即多取之，犹之任土制赋也。独银之为物，不从天降，不由地出，不自人为，当其耗竭，孰从而给之。

今人徒见征银之日久，若为固然，不足深虑，不知曩时所以未至匱绝者，以其随敛而随发，灌输如环故，犹可支耳。今事势稍异矣，而征

<sup>①</sup> 这个说法与大田由纪夫的研究不谋而合。他认为，促进明朝政府赋役折银的原因并非民间用银的扩大，以及与之相伴的钞法不振，而是永乐以降行政、财政体系的变动，必须在相距遥远的地方之间方便地进行大规模财物移动。参见大田由紀夫「元末明初期における徽州府下の貨幣動向」『史林』第76卷第4號、1993、1~33頁。

之愈亟，率此不变，必有隐忧，不知持算者将恃何术，以善其后也。

严氏最后认为，米、粟产自田土，丝、绢出自织造，即使过量征取，也属按照地利原则征缴的赋税；白银非田土所产、人手所制，一旦耗竭，无法供应。他提醒后来人，之前民间白银之所以不会枯竭，在于国家随取随发，循环周流，故可以支撑。如今情形不同，国家催征愈急（白银沉积可能更甚），隐藏祸患，故希望这个局面可以得到改善。这种重本轻银的逻辑，在明末蔚然成为一股显见的经济思潮。

由上可见，严书开从货币演变史的角度论述了白银崛起的大体过程。在其论述中，他的分析常常结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民间流通及对外支付等因素综合考量，可谓颇得货币分析之要领。同时，他对于学界重点关注的自宋之后白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做了一定的概括。在明代货币白银化这个问题上，其分析不仅精要且举有实例，委实多有阐发之见。不过，严氏之论毕竟囿于时代各方面的限制，未必能够十分周全。因此，要全面、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需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综合分析这个问题。